



冷战期间在台佛刊《中国佛教月刊》时论研究（1954–1987）

**A Study on the Editorial Commentaries of
Chinese Buddhist Monthly in Post-War Taiwan (1954 – 1987).**

张一鸣

ZHANG, YIMING

22ALB0102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4



冷战期间在台佛刊《中国佛教月刊》时论研究（1954–1987）

**A Study on the Editorial Commentaries of
Chinese Buddhist Monthly in Post-War Taiwan (1954 – 1987).**

张一鸣

ZHANG, YIMING

22ALB0102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4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4 Zhang Yi M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与难题.....	4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6
表1 已整理现有的《中国佛教月刊》卷期数.....	7
 第二章 各类“反共”时论文章	8
表2 《中国佛教月刊》第1卷至第7卷“反共”时论统计.....	9
第一节 “反共抗俄”、“共匪迫害宗教”与“谴责共匪暴行”	10
第二节 大陆沦陷与反攻大陆.....	17
第三节 提及“自由中国”	21
第四节 声援西藏藏传佛教.....	23
第五节 反共的意识自觉.....	27
 第三章 代表高僧的时论文章	32
第一节 章嘉.....	32
第二节 白圣.....	36
 第四章 结语.....	40
参考文献.....	41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张一鸣 ZHANG, YI MING

学号：22ALB01028

日期：2024年11月22日

论文题目：冷战期间在台佛刊《中国佛教月刊》时论研究（1949-1987）

学生姓名：张一鸣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中国佛教月刊》作为冷战时期在台中国教会的宣传媒介，其时论文章集中反映了当时台湾佛教界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反共”意识形态的传播。台湾佛教界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及当局对教会的高度管控，不得不通过宣扬“反共”政治立场，与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其生存与发展。因此，《中佛刊》不仅成为佛教界支持政府政策、宣传反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也体现了当时佛教界对政府密切依附的政教关系。而这种政教关系经过长期维系，诱发了台湾佛教界从法师个人到教界组织的“反共”政治意识自觉，成为冷战时期台湾佛教界的显著特征。

如今尽管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战后台湾的政教关系进行广泛探讨。但并没有研究系统性地从该时期的佛刊时论出发，对宏观历史做补充与再阐释。因此，本篇论文从文本分析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佛教月刊》中时论文章进行统计、分类与整理，探讨其意识形态宣传在冷战前十年的高涨、中十年的自觉与后十年的衰退动态；以及政教关系随民主化进程逐渐脱离“反共”框架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国佛教月刊》、冷战时期、政教关系、反共意识形态

致谢

论文完成之际，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致以谢意。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方美富老师。感谢您在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建议。三年弹指一挥，戴着口罩在国学概论上拿免费的消毒湿巾，仿佛是上个学期刚发生的事情。记得新生那会，我是“插班生”，生理刚刚结束隔离就把心理送去下一段隔离。感谢方老师在这一段时期的指引，改变了我大学三年的生活。

其次，我要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各位老师与办公人员。感谢你们三年里给予的帮助。在中文系的日子是累并快乐着的。因为中文系，我才能学习到书中学不到的经验；也只能是中文系，才有如此多的锻炼机会。

还有我身边的同学与朋友，感谢三年的陪伴。有太多与你们在一起的美好回忆了，是如今想到都会戒断的快乐。在金宝一起生活了三年，已然像是一个社区、一个世界，非常留念和你们做邻居的生活。

在此，我要特别感恩我的父母。无论是生活上的关怀，还是精神上的鼓励，您们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来源。没有你们一直以来竭尽所有的支持，就没有我在拉曼的大学三年，没有我如今所收获的一切。

最后，感谢所有为本篇论文的顺利完成提供过帮助的人，如在槟城三慧讲堂图书馆收集论文资料阶段，给予了我极大便利与时间的蔡女士。尽管论文可能存在不足与疏漏，但每一位的支持都是论文成形路上的拼图，由衷致谢。

最后的最后，福至心灵，愿所学之道常伴前行；佳友常忆，感恩师长指点迷津；迎风启航，虽别离难舍，前路共祝坦途无忧。

第一章 绪论

《中国佛教会会讯》由迁台中国佛教会创刊于1952年底，是49年南京中国佛教会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台湾后主要的通讯机关公报。1954年改版为杂志，即为我们现今所讨论的《中国佛教月刊》（简称《中佛刊》）。

1954年3月《中佛刊》发行首刊，因准备工作的不完善，于1955年6月停刊一年，直到1956年6月15日才以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回到大众视野。刊物由时任中佛教会常务理事白圣为发行人，心悟为主编的中国佛教编辑委员会担任编辑¹。其三大创刊宗旨为推行佛教法令、报导佛教动态、弘扬中国佛教²，意在振兴彼时汉传佛教在台的势衰环境。

而《中佛刊》作为出生正统、意义明确的佛刊，在介绍佛教法理经论之余，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同时展现出了高度配合。该情形常体现在刊登的时论当中，由法师、居士或社会人士撰写的时论会表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歌颂，且其数量是远超越同时期其它在台佛刊的³。其直接原因为台湾戒严状态下“报禁”对言论的管控；根本原因则是中佛教会的政治傀儡性。

对于“为何拥政”的历史学研究，前人已经做过详细的考证，本篇论文重点是以《中佛刊》中刊登的时论文章为对象，按照文献分析法处理文本，结合历史与社会学的研究，探讨《中佛刊》被注入的政治职能如何发挥，进一步补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台湾佛教“如何拥政”的讨论。

¹ 可见于《中国佛教月刊》刊尾

² 白圣，〈编后琐话〉，《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8。

³ 如《海潮音》。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中国佛教月刊》是由在台中佛会一手创办的，前身就是组织的公关报刊，因此较于同时期的佛教刊物更具有代表性、权威性。我们通常认为《中佛刊》的诞生对台湾汉传佛教具有临危受命的意味，然而在此之前诸如《海潮音》、《菩提教》、《人生》、《觉世》等代表性的教界期刊就已有流传，这是不容忽略的。但即便如此热闹也并不影响《中佛刊》一经发刊就被赋予的权威性，白圣在创刊第1卷第1期的《编后琐话》中提到：“《中国佛教》是中国佛教会主办的，中国佛教会乃佛教的最高行政机构……”⁴以及同期的《对于中佛刊的献议》补充说：“既然挂的是‘中国佛教’同时又是中国佛教会创办的，则本刊就负有二大责任：一方面要介绍中国佛教，一方面要指导中国佛教。”⁵白圣的声明与上述文中的“指导”二字，皆在公示《中佛刊》在台佛教刊物中具有的领导职能，即教内刊物的代表意义。因此，其中的时论足以象征当时背景下教刊乃至中佛会的权威立场了。

然而台湾中国佛教会与《中佛刊》表面是由政府支持的教内权威，实际上却是政治的工具。自全球爆发意识形态的冷战后，地域政治的全球化、阵营化改变了战后台湾的政治局势发展，形成了“内战持续”和“冷战对峙”的双结构趋势⁶。台湾此后长期的威权统治型态便寄生在此趋势下，间接导致了为保护

⁴ 白圣，〈编后琐话〉，《中国佛教》，页8。

⁵ 慈氏，〈对于中佛刊的献议〉，《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2。

⁶ “双结构趋势”由学者侯坤宏提出。“内战持续”是指“戒严时期”政府的管控；“冷战对峙”指在美国的需要下，参与意识形态对峙。而双结构趋势下的台湾之所以能够进行独裁威权统治，是美国基于“冷战”的需要因此容许。所以在与美国断交后，政府随即便受到民主改革诉求的动摇。详见侯坤宏，〈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北台湾通识学报》2011年4月第7期，页32。（31-87）

集权而诞生的管控政策，即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状态。在台湾戒严体制下的政府，对处处进行干涉和管制，佛教也不例外。

中佛会在台湾复会的初期，就因无法解决各派系间的纷争而被政府乘机而入了。在《中佛刊》申请登记证的同一时期，1952年5月，中佛会收到内政部公文，要求应按章程规定改选和回复运作，否则将撤销其立案许可和下令将其解散⁷。中佛会在不被政府收编便解散的胁迫下，最终受到政府硬性指派人选而重组，沦为戒严状态下政治操纵的工具。因此在戒严期间，以中佛教领导的佛教界，忠诚地支持政府反共政策，竭力批判共产主义⁸。而《中佛刊》自然成为冷战时期对抗中共意识形态的武器，其所谓“时论”，主旨便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复国”政策。

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冷战时期的台湾佛教期刊《中国佛教月刊》，因此部分内容涉及冷战时期两岸关系、台湾的政治立场及历史事件的叙述。在引用《中佛刊》中的敏感术语时，如“反共”、“共匪”等词汇，始终是在冷战时期台湾佛教界的政治立场和言论背景下分析和引用的。论文中的相关引用，完全是在历史学术研究的框架下进行，不带有任何情绪化或意识形态上的评价，并均附有历史背景的说明。

特此强调本论文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政治宣传或对现行两岸政治局势的评价。所有引用的历史术语和政治表述，均是在严格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框架下使用，目的是进行相关历史现象进行学术性分析，帮助理解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政府政治的复杂性，而非对现状的评价或判断。

⁷ 详见杨书濠，〈潮起与潮落（1945–2010）以战后“中国教会”的在台沿革及其转型为中心〉，《北台湾通识学报》2011年4月第7期，页98。（87–139）

⁸ 江灿腾，〈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的转型与创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0年10月第2期，页167–168。（167–177）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与难题

本篇论文虽为《中国佛教月刊》对于时论的探讨，但在文中并没有涉及到对佛教道义教理的诠释。因此，前人的研究着重参考的是历史学、社会学者对战后台湾政教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和对中国佛教会、战后台湾政治史、大陆政治史等研究的回顾。

侯坤宏教授在《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中，对台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全面地整理、论述。其将二战后台湾佛教出现的政教关系以1987年戒严状态解除为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对于1945年至1987年期间的部分，研究中详细地归类出政府管制佛教三个方面和佛教界十种大力支持政府的途径；以及简要提及教界人士在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上的自觉。本篇论文主要将侯坤宏教授的研究作为政教关系发展历史的背景铺垫。

战后台湾佛教受到政治影响的发展史，江灿腾教授的《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的转型与创新》有全面的梳理。文章分别从历史学及社会学的视角，检讨台湾佛教在“日本投降”、“戒严”、“解严”和“当代”四个时期收到台湾政治的影响。其中提到台湾佛教是在冷战时期与国民党最为密切的宗教组织，文章对戒严期间佛教界与国民党关系的观点，是《中佛刊》涉及到政教关系时次要的辅助论据。

在台中国教会的研究，杨书濠在《潮起与潮落（1945-2010）以战后“中国教会”的在台沿革及其转型为中心》详细的介绍了中国佛教会在随国民党政府撤台后的发展。整理包括会议资料和组织内部的人员改选及变动在内的进

程细节，其将被作为讨论中佛会的资料来源。

日本学者若林正文，在《战后台湾政治史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中对战后台湾政治史的重构是颇具意义的。如“七二年体制”概念的提出，就是解构再建构了的新社会学视角下，探究戒严期间实行威权主义的国民党是如何一步步被民主化、台湾化的。其研究对冷战后期《中佛刊》中文风的转变，提供历史背景发展的理论基础。

前辈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处理政教关系是合适且必须的。但无论是以冷战时期台湾戒严的大历史背景出发，还是用台湾佛教界视角或战后当局视角切入，其目的皆在力求揭示“为何拥政”的全局，对“佛教依附政府”的发展作线性梳理。如此俯视，虽适用于宏观地处理历史学议题，却容易忽略细枝末节的点滴动态，即“如何拥政”的细节展现。因此，从文本角度整理《中佛刊》的时论文章，发掘体现政教关系的事实论据是学界讨论此问题时所忽视的。

处理文本的优势在于可以将一部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前文提到，《中佛刊》在战后台湾的佛教界具有代表性与权威性，而期刊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地陈述时论，恰恰非常契合通过梳理以展现《中佛刊》或是中佛会背后流动的意识。

另一方面，整理文本意味着工作量的巨大，以及需要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来处理海量的文字。《中佛刊》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距今以70年之久。自1954年出版到1987年解严共31卷杂志，目前马来西亚已知的存档仅有在槟城三慧讲堂的图书馆内才能借阅。在有限研究时间条件下，同时需要快速且高质量的处理文字，是本次研究最大的难题。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冷战时期台湾戒严状态下《中国佛教月刊》中刊登的时论文章，即高度配合国民党政府“反共复国”政策的文章。

论文中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以《中佛刊》为核心文本，系统梳理和提取其中提及“反共复国”的时论文章。首先会以文献分类的方式，按主题提及频率整理《中佛刊》的时论文章，分主题或事件进行细致归类，如提及西藏、自由中国或与中共竞争中国佛教正统地位等；再统计并分类法师在其中的参与成分，对他们在《中佛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整理阐述；最后对冷战期间《中佛刊》种高频出现的时间进行总结列举。而以上三部分均是从文本出发，分析期发挥“拥政”职能，即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配合国民党政府“反共复国”的政策。

文献分类中会用到统计法，将部分数据转化为统计表格的形式呈现。而经过统计的篇章数据会作为论据，用于论证其主题出现在篇章的评率或次数等。

文献分类后用内容提取的方式，聚焦《中佛刊》中配合政府呼声最高的关键人物、重要或频繁的事件。如创刊前章嘉曾多次投稿且作为头版文章刊登，其主题多为外交公文，意在对外宣传在台佛教的正统性和政府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立场。

因是冷战时期的研究，故时间范围聚焦在1954年3月至1987年7月。自在台中国佛教会创办《中国佛教月刊》始，至冷战末期台湾戒严状态解除。因三慧讲堂内《中佛刊》期刊数已尽可能完整，但仍没有搜集完全，故截止论文完成前已整理现有的卷期如表1所示：

表1 已整理现有的《中国佛教月刊》卷期数

卷数	年份	期数
第 1 卷	1954 年-1955 年	1/4/5/6/7/8
复刊第 1 卷	1956 年-1957 年	1/3/4/5/6/7/8/9/10/11/12
第 2 卷	1957 年-1958 年	2/4
第 3 卷	1958 年-1959 年	2/4/5/6/7/8/9/10
第 4 卷	1959 年-1960 年	1/3/4/5/7/8/9/10/12
第 5 卷	1960 年-1961 年	5/6/8/9
第 6 卷	1961 年-1963 年	2/6/10/11/12
第 7 卷	1963 年-1964 年	1/2/3/4/5/6/8/9/10/11/12
第 12 卷	1967 年-1968 年	2/3/4/5/6/7/8/9/10/11
第 13 卷	1968 年-1969 年	1/2/3/4/5/6/7/8/9/10/11
第 14 卷	1969 年-1970 年	1/2/5/6/7/8/9/10/11/12
第 15 卷	1970 年-1971 年	1/2/3/4/5/6/7/8/10/11/12
第 16 卷	1971 年-1972 年	2/3/4/7/8/10/12
第 17 卷	1972 年-1973 年	1/3/4/5/7/8/9/10/11/12
第 18 卷	1973 年-1974 年	1/2/3/4/5/6/8/9/10/11
第 19 卷	1974 年-1975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20 卷	1975 年-1976 年	1/2/3/4/5/6/7/8/9/10
第 21 卷	1976 年-1977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22 卷	1977 年-1978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25 卷	1980 年-1981 年	1/3/4/5/6/7/8/9/10/11/12
第 26 卷	1981 年-1982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27 卷	1982 年-1983 年	9/10/11/12
第 28 卷	1983 年-1984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29 卷	1984 年-1985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30 卷	1985 年-1986 年	1/2/3/4/5/6/7/8/9/10/11/12
第 31 卷	1986 年-1987 年	1/2/3/4/5/6/7/8/9/10/11/12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槟城三慧讲堂图书馆

第二章 各类“反共”时论文章

在《中佛刊》创刊的前十年中，配合国民党政府“反共”的文章最多。几乎每一期杂志都包含对“反共”的热忱和“蒋公”的拥护，且大多为社论刊登于版首。如开刊第1卷第1期中，本期除《祝诗》共有十篇文章，其中细算内容部分：向“国大第二次会议有关佛教的问题提议”一篇⁹；赞扬“反共归国义士（即韩战中被俘虏并遣返至台湾的中共部队士兵）”三篇¹⁰；抨击中共在大陆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打压佛教内容的共四篇¹¹；而仅剩的两篇为中佛刊的献辞。白圣法师在开刊时说，中佛刊将是政府与佛教之间的桥梁¹²，可见《中佛刊》一开始就被作为政治宣传时论的工具，同样也是中佛会向政府表示衷心的媒介。

《中佛刊》中的热点时论文章集中在创刊的前十年，而正好因为1963年到1967年存在材料空缺，所以可将其作为一个代表时期。据现有期刊统计，专为创刊第1卷到第7卷十年间，56期刊物包含各类“反共”时论文章共332篇做了系统的统计。本篇论文将其分为以下五个小节论述：一、“反共抗俄”、“共匪迫害宗教”与“谴责共匪暴行”；二、大陆沦陷与反攻大陆；三、自由中国；四、声援西藏藏传佛教；五、反共的意识自觉。在创刊的十年间，平均每一期

⁹ 见《各地教讯》栏《国大第二次会议有关佛教的提议》一文。中国佛教杂志社，《国大第二次会议有关佛教的提议》，《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7。

¹⁰ 三篇分别为《读〈陈文光义士与中国教会书〉后》、《舍己救同胞，乃佛者正途！》与《重要公文》。《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5、6。

¹¹ 《发刊辞》、《佛教徒应有的责任》、《漫谈生死与因果关系》、《编后琐话》四篇均有内容提及并抨击中共在大陆对佛教的打压。详见于《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1、2、3、4、8。

¹² 白圣，〈为中佛刊发行说几句话〉，《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3。

都有5至6篇文章或教内新闻提及或讨论“反共”政策，可见其数量之多。这一时期的[文章主题](#)可分为互相成立的七种，再根据每篇文章中主题被提及的成分质量或频率分成A、B、C三类，统计其提及次数，制成表2如下：

表2 《中国佛教月刊》第1卷至第7卷“反共”时论统计

A：主要，全文主题涉及。

B：次要，文章部分段意提及。

C：简单提及，文章部分语句。

文章主题	总篇章数	A类篇章数	B类篇章数	C类篇章数
“反共抗俄”、“共匪迫害宗教”与“谴责共匪暴行”	121	43	22	56
大陆沦陷与反攻大陆	62	19	8	35
提及自由中国	51	19	7	25
佛教有助于政府“反共”	33	16	11	6
声援西藏藏传佛教	28	20	6	2
称大陆“伪佛教”或与其在国际争夺中国佛教正统地位	17	11	4	2
提及特定事件	20	15	5	
总篇章数	332	143	63	12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佛教月刊》第1卷至第7卷原刊搜集制作。

第一节 “反共抗俄”、“共匪迫害宗教”与“谴责共匪暴行”

《中国佛教月刊》的时论中，最常见的主题便是“反共抗俄”、“共匪迫害佛教”与“谴责共匪暴行”。三者在含义或在文章中发挥的“拥政”职能上相近，故归为一类讨论。在发刊前十年中，诸如“反共抗俄”为主题或口号的长短时论数就占据了总数近四成，由此可见，这类主题定是适合下文章的，也能够最直观地反映支持政府“反共”政策的立场。如1954年第1卷第4期中，章嘉在头版发表的《边人微言》：

希望反共抗俄中兴复国的大业，提早完成，因为共匪俄寇对于人类的摧残太惨毒，而赤化地区也很广，它们既没有主义，也没有法律，更没有道德，所有的只是极野的點性和令人不堪忍受的魔障、屠杀、奴役饥饿。匪区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已是书不胜书，而伦常的败坏、道德文化的沦丧、宗教的致贺感奋良深祇毁灭、死亡率的骇人数字，都不容许自由世界当兹艰巨弥切慚人士，再袖手旁观，尤其是受害最大的中国国民，更应当大家齐心协力，在总统副总统领导下，早日收复大陆，拯救同胞。¹³

文中的“边人”即是从佛教徒的视角对政治提出“微言”，所谓“微言”则是对政府“反共抗俄”政策的大力支持。选取的这一篇较为全面，即提及“反共抗俄”又有“谴责共匪暴行”的要素，结尾也有提到对政府的态度。

而“反共抗俄”等三要素除了作为文章主题之外，其经常以一种政治口号

¹³ 章嘉，〈边人微言〉，《中国佛教》，1954年6月10日，第1卷第4期，页2。

的形式出现以表示政治正确。比如1956年11月期，律航在《台湾弘法回忆录》中便穿插了一个名为“站在反共抗俄的国策下弘扬佛法”标题，内容如下：

共匪勾结苏俄，出卖祖国，苏俄利用中共，赤化世界。其手段百出，总不外背弃因果，抹杀人性。而弘扬佛法，则倡明因果，随顺人性。所以彼尚残暴，我讲慈悲；彼逼欺诈，我请诚实，彼虽装和平，我宝行真正平等自由。以佛法“无我”的精义，击破唯物的谬说。正配合当前国策，为反攻大陆最上的心理战。¹⁴

与“反攻大陆”一致，“反共抗俄”作为当时的国策在《中佛刊》中有被口号化的迹象，这事迹上是中佛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管控后不可避免的。何卓恩曾就期刊的“党化”进行过讨论，其以《自由中国》为例，若文化教育无法独立于政治而得到自由发展，其构建出来的体系必然是一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因为意识形态主张是由政党操纵的¹⁵。《中佛刊》同理，在没有摆脱政党的影响下即使在其基础上宣传佛法，也需要夹杂意识形态以向政府表态，不经意间教育的输出就从佛法而转向反共复国。

这一类主题时论的称呼中，对中国共产党常称为“匪”、“共匪”、“赤匪”、“毛匪”、“朱毛匪帮”。在冷战框架下，也会带上“俄寇”、“俄匪”等对前苏联的称号以示立场。在具有中佛会声明性质的《本会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一文中，展示了中佛会立场下昵称的来由：

¹⁴ 释律航，〈台湾弘法回忆录〉，《中国佛教》，1956年11月30日，第1卷第4期，页22。

¹⁵ 何卓恩，〈党化教育vs公共教育：《自由中国》的教育论述〉，《思与言》2011年49卷第1期，页70。

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依其实际情形，称之为朱、毛匪帮）早为俄帝之侵略工具，受其驱使，窃据中国大陆，成立伪政权，极尽破坏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之能事。¹⁶

文中提到的称呼与中苏间关系的评定成为一种标准，频频出现于后续带有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峙色彩的文章中。这些文章会在“反共”的大背景下对共产主义、唯物主义进行批判，以证立场。

然而并非所以时论都是站在冷战对峙的斗争思维中去评述意识形态。名为梵影的僧人在“提倡素食，禁止杀生”的《西游散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无可否认，这些威胁无非是受到东、西两大集团思想不同的影响，民主与共产两种主义针锋相对。由于彼此政治理念各异，所以明争暗斗，互相指责。共产主义认为民主政体剥削劳工阶级的血汗，必须消灭它，人才可以享受平等和快乐；而民主国家则认为共产主义是欺骗和暴力，必须将其打倒，世界才能和平。其实呢？即使消灭任何一个主义，世界依然离不开战争，人们仍然得不到和平的保障。这样的话，在政治家听来可能以为是狂妄之谈，但在佛学家听来，或许能够领略其中多少道理。¹⁷

文中的用佛教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

¹⁶ 章嘉，〈本会致使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中国佛教》，1954年10月30日，第1卷第7、8期，页1。

¹⁷ 梵影，〈西游散记〉，《中国佛教》，1957年3月8日，第1卷第9/10期合刊，页22。

认为：“佛教是救世的，而非斗争的”¹⁸。用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称呼，以及像这样跳脱出冷战思维真正用佛教的视角看待政治斗争，在整个冷战时期的《中佛刊》里都是很难搜寻到的。在国民党政府的操纵和戒严时期的“文字狱”下，其能够在《中佛刊》刊登是耐人寻味。

“共匪迫害佛教”这一主题是三个要素中与佛教徒关系最为密切的，因为它直接的关系到“教胞”的利益。此主题常被用在为大陆佛教发声和渲染“反共”情绪的时论段落中，一般会结合大陆发生的宗教事件作为论据进行批判。；例如在虚云大师去世后，《中佛刊》发表了一篇名为《追思虚云大师》的社论，略取一段：

最后，大师终于入粤，却遭遇云门事变，屡次被共匪毒打，死而复生……

民国四十一年，伪“中国佛教协会”在北平开锣，秧歌王朝派了许多匪干伪装成佛教徒，从中破坏佛教。在会上提议废除《梵网经》、《四分律》、《百丈清规》等戒律，允许僧尼自由结婚，开放饮酒食肉的禁戒，蓄意将大陆佛教的传统精神一手扼杀，当时要不是大师竭力反对，挽救转来，大陆上的佛教，早已“寿终正寝”了。¹⁹

其中描述了虚云长老曾遭受的云门事变²⁰，透过虚云生前在大陆的经历，引出北京成立“伪中国佛教协会”，“欲废除佛理”等迫害佛教的事件，其同类型的时论论述与之不尽相同。

¹⁸ 梵影，〈西游散记〉，页22。

¹⁹ 中国佛教杂志社，〈追思虚云大师〉，《中国佛教》，1959年11月15日，第4卷第3期，页3。

²⁰ 是指1951年因“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云门寺僧受殴打拘禁的事件。侯坤宏，《浩劫与重生：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台南：妙心出版社，2012），页95。

而除了文章以外，《中佛刊》在1954年创刊之初曾设名为《大陆共匪摧残佛教之罪行纪实》的专栏，刊登当时在大陆发生的“迫害佛教”事件，但1956年复刊后则被移除。数量不多，将其整理如下表：

《大陆共匪摧残佛教之罪行纪实》专栏的简讯

标题	卷期	时间
共匪良心病狂 强迫喇嘛洗脑	第1卷 第4期	1954. 6. 10
不堪匪共迫害 佛徒切盼反攻		
顺德两古刹 遭共匪拆毁		
大陆共匪去年五月宣布佛教为“反动组织”后，韶关八十二岁的礼言老和尚等十二人遇害	第1卷 第5期	1954. 7. 10
藏人对匪失望展开反共运动		
传匪帮以兵力胁迫达赖赴平		
青海佛教圣地“塔儿寺” 最近亦遭匪帮摧残破坏	第1卷 第6期	1954. 8. 10
共匪普遍消减佛教 残害人群	第1卷 第7/8期	1954. 10. 5
不堪共匪迫害 西藏喇嘛大逃亡		

随着政治影响逐步加深，《中佛刊》中对“迫害”的讨论不再限制于宗教，而是与其它可以被批判的对象一并统称为“共匪暴行”。同时为了政治正确，时论提及的内容也变得空洞，该主题发生口号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比如谈及“救世”的教理，就一定要诉说大陆同胞水深火热的生活，在《佛教徒应有的责任》一文结尾写到：

今日世界是人类自相残害的世界，尤其是我国大陆成为群魔乱舞的世界，已经快四年了。在那里，有我们四亿数千万的善良同胞，天天受到赤色恶魔的暴行迫害，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杀死、冻死、饿死，其余还没有

死的，也都生活在恐怖之中。²¹

而“谴责共匪暴行”并没有完全沦为口号的原因，是部分篇章讨论到这一主题会附带着事件以作为事实论据，与上文提到的“迫害宗教”一致。有如《开释迦老子的玩笑》一文中，开篇就描绘了一个发生在大陆的事情：

从前陕西省有一位靠拢的行政官员，忘其名，共匪斗争他的父亲，判死刑，要他当刽子手。一阵枪声后，便在老爸爸的脑袋和胸前背后开了好多洞，这是真的儿子打死老子的共匪暴行。²²

像如此有事实论据的时论虽然可以调动读者的情绪，但其事实论据是否真为“事实”则有待考证。除了诸如人物离世、国际关系等可被考究的历史外，许多“共匪暴行”可能是当时社会乃至政府广泛流传宣扬的，因此也会在时论中出现，如第1卷第5期的《一封公开的信》提到：

一位广东小鬼，在共军以“党性强”（即是没有人性）见称，鬥爭清寡杀人不眨眼而自谓英雄，大陆变色时，他已在骷髅上爬到区长职位，衣饰荣归，炫耀乡里，正当回到本乡，远见开辟争会，公审台上，站一被鬥爭老人，他得意忘形，一路喊杀，跑到那里，土共乃请他作主，站的人就是他亲生父亲，他既要党性而失人性，也就亲杀老父，以表示前进，但是晚宿

²¹ 吴仲行，〈佛教徒应有的责任〉，页3。

²² 胡国伟，〈开释迦老子的玩笑〉，《中国佛教》，1956年6月15日，复刊第1卷第1期，页7。

家中，恶业到头，自己举枪自杀了，一念之恶，当生果报可不怵惕！²³

这里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共干部因批斗错杀父亲，而后悔自杀的事件。而该事件紧接在下一期从另一位作者笔下出现：

共产党的干部，因迫于组织的知道，斗争自己的父母，最后表示自己的前进，开枪把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打死，然后也拿枪自杀……知道儿子不该打死父母，因为恶势力的压迫，不能不这样的做。但已经做了，心里未免不厌恶共产党的残暴，痛恨自己的的错误，不如跟父母意思，以谢父母。²⁴

二者处理该故事的角度不一样，因此阐述该事件的口吻存在差别，可是抨击共产党“罪恶”、“残暴”的目的是高度统一的。由此可知，这类时论因为携带着政治职能，所以更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输出效果，即注重“谴责共匪暴行”中的“谴责”二字，非后者。

而时论中谴责的“暴行”也是可以总结为“生命的奴役”和“人性的抹灭”两方面。二者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时常在文章中被同时提及。控诉中共对生命和精神的奴役，主要从对大陆的政策引入，例如中国大陆在58年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时论中常借以发挥的对象。张廷荣在《中佛刊》中发表的时论就多次将人民公社视为“暴行”。像《敬德对学人用功的效益》中在讨论孝与德时，控诉人民公社运动是把人放到机器中变成没有独立精神的禽兽，物

²³ 同道，〈一份公开的信〉，《中国佛教》，1954年7月10日，第1卷第5期，页6、7。

²⁴ 南亭，〈地藏菩萨事迹——中国佛教会佛学讲座第四次座谈会议〉，《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0、11。

化人，阻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²⁵。再如《佛家基本精神》里，谈理性尊严时批评大陆在共匪的“人民公社”暴政下，将大陆全部同胞，连儿童亦不能幸免，制造全部的奴工营，是对肉身的奴役²⁶。

第二节 大陆沦陷与反攻大陆

大陆沦陷与反攻大陆均强调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态势，因此本文将两者归为一类。“大陆沦陷”并非指代一个时间段，而是一个时间点，其本身缺乏延展性。在《中佛刊》的时论中，为凸显国民党政府反攻复国的政策目标，这一表述被赋予了历史概括性，即仅一词就可概括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的失败及随后撤台，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在创刊的《发刊辞》中就有提到：

目前大陆沦陷，群魔乱舞，建国兴教，经纬万端，其因难当千百倍过去，此亦如所周知之事实。²⁷

“沦陷”一词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其不仅代表国民党对大陆拥有宣称，不承认中共政权在大陆建立的正当性，还淡化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的失败和权力丧失，强化意识形态的对峙以便政治宣传。因此，“大陆沦陷”常作为反共论述中的历史背景来铺陈，并频繁出现在主要的时论中。同时，“大陆

²⁵ 张廷荣，〈敬德对学人用功的效益〉，《中国佛教》，1959年1月15日，第3卷第5期，页6。

²⁶ 张廷荣，〈佛家基本精神〉，《中国佛教》，1959年3月15日，第3卷第7期，页18、19。

²⁷ 章嘉，〈发刊辞〉，《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1。

沦陷”代表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丧失，“反攻大陆”象征着对政权收回，二者具有逻辑关系，故在时论中常常作为一套连贯的政治色彩主题同时出现。

反攻大陆是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核心，意在通过军事行动恢复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既然是核心政策自然受到中佛会高度支持，其主题趋向对政府反攻大陆地鼓吹和对中共在大陆情况的贬斥宣传。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使《中佛刊》中反攻大陆的主题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口号化。例如《简介木里王国》中通篇都在讲述一个曲折迷离的故事，但结尾文风大转变：

今日朱毛奸匪窃据大陆的暴力专政，现已走上了分崩离溃的道路。一旦反攻的号角响了！我们国军就如同秋风扫叶似的一鼓作气收复大陆。²⁸

反攻大陆的时论在冷战时期的《中佛刊》持续时间最久，如佛教会议、新年祝福、佛诞节广播、祝寿活动、支持竞选等场景仍常出现。拿政治活动举例，1971年第五任领导人改选，教闻《八百万佛教徒敦请蒋公候选连任 总统》写到：

英明的 总统蒋公，为我军民所敬仰拥戴归向之领袖，今值第五任总统改选，全国军民均一致竭诚的殷望 总统蒋公再候选连任第五任总统，以领导全国军民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业。²⁹

1972年4月，蒋介石连任，《中国佛教会代表全国佛教徒 上电 总统敬贺连任》

²⁸ 证空，〈简介木里王国〉，《中国佛教》，1957年6月30日，第2卷复刊第1期，页19。

²⁹ 中国佛教杂志社，〈八百万佛教徒敦请蒋公候选连任 总统〉，《中国佛教》，1971年12月15日，第16卷第4期，页25。

刊登教讯如下：

钧座当选蝉联第五任总统，继续领导反共复国大业，天与人归，举国欢腾，我全体教徒当秉承庄敬自强训示，践履行，并深信中兴在望，复国可期，特电申报，敬表拥戴之忱。³⁰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中佛刊》刊登净心恭辑的悼文《总统 蒋公与佛教》，文章写道：

总统蒋公毕生的志业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族阵容。我们佛教同道们应该更加精诚团结，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佛教的力量，来完成蒋公未竟的遗志与大业，才能报答蒋公对佛教护持的恩德。³¹

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接任。1978年2月新闻稿《推举蒋院长出任总统 全国佛教徒欢欣拥戴》一文推举蒋经国出任领导人，其立场鲜明，明确对“反攻复国”政策的高度支持和期待：

深信蒋院长勤政爱民，众望所归。必能领导全民，加速反攻大陆，完成复国建国伟业。³²

³⁰ 中国佛教杂志社，〈中国佛教会代表全国佛教徒 上电 总统敬贺连任〉，《中国佛教》，1972年4月15日，第16卷第8期，页25。

³¹ 净心，〈总统 蒋公与佛教〉，《中国佛教》，1975年4月15日，第19卷第7期，页5。

³² 中国佛教杂志社，〈推举蒋院长出任总统 全国佛教徒欢欣拥戴〉，《中国佛教》，1978年2月15日，第22卷第5期，页18。

而蒋经国执政后，台湾进入了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时期，逐步走向民主化，《中佛刊》提及“反共复国”的时论开始逐年降低。若林正丈曾对这一发展从“一个中国”原则的衰退及其与“七年体制”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³³。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秩序，台湾的地位因此搁置。美国在这一框架下的战略转移，要求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立通过“和平解决”。在意识形态层面，国民党希望通过“反共”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用以巩固威权，缓解台湾社会的分裂。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化，本土意识逐渐抬头，民族主义思潮崛起。这一过程同时导致了国民党“正统中国国家”叙事逐步瓦解。³⁴与此相应，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为社会注入了新的价值取向，“反攻复国”这一冷战思维下的政治口号在台湾社会的认同度也随之下降。

但冷战末期的台湾政治环境即便已经出现上述改革的趋势，《中佛刊》的时论依旧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复国”。这是《中佛刊》乃至中佛会的政治职能体现，如1987年台湾与大陆已经开放探亲政策的背景下，社论《对政府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之省思》在对政府表示支持的同时，依旧对中共保持敌视，并提及对反共复国的企盼：

从长远的立场去看，自然会带给大陆同胞一个比较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在共产制度的统治下，是人类失去了自由、民主以及自由企业所带来的繁荣，尤其最重要的是失去法治下的稳定和安全，可是这些都带给复兴基地的台

³³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译，《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页6。

³⁴ 引用若林正丈对台湾政治结构变动的阐述，尤其整理涉及到80年代“反攻大陆”、“反共复国”态势的论述。若林正丈，《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页6。

湾不断的进步……故我们对于政府的开明政策，不论从人道、传统伦理，或从佛教大悲救世的立场来看，都能够得到全体国人及宗教界的充分支持……我们必须不断进步、不断强大，使国土得以光复，才能重整家园，实现大团圆、大探亲的愿望，与全体同胞共勉之！³⁵

第三节 提及“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作为时论中独特的一类主题，是因其具有冷战思维下对峙的代表性。这类时论会将台湾称为自由中国，一来用自由形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以达到“拥政”的目的，二来制造与中国大陆的对立以求配合反共政策。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使得“自由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或文化的标识，它更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宣示、政治正确的表达，承载着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在冷战意识形态下的对立。

时论对于自由中国的表述与之前的主题在体现拥政方式上存在差异。上述诸如“反共抗俄”和“反攻大陆”是可以结合时论穿插在文章中的，好比之前的章节曾提到，有文章在介绍佛教经纶道义时，可以根据“救世”引出大陆的现状从而穿插对中共的批判。如果说这样的主题是为了达到引出反共的目的，那么“自由中国”则是“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引子。其在塑造地域差异的同时，文章中一定会伴有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宣扬，从而突显出《中佛刊》高度支持政府的立场。比如在净心《庆祝佛诞的意义》一文中开篇

³⁵ 中国佛教杂志社，〈对政府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之省思〉，《中国佛教》，1987年10月31日，第31卷第10期，页1。

提到佛教同胞在“自由宝岛”上庆祝佛诞节，而在整篇塑造完自由中国的盛况后，即是对大陆的地域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正文如下：

各位佛教同道，当我们在这自由的宝岛上，兴高采烈地庆祝佛陀诞辰的时候，想到大陆上的苦难同胞们，深陷铁幕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实在是何等的凄惨痛苦。自大陆被共匪窃取之后，共匪露出了其狰狞的本来面目，伸出血淋淋的手迫害大陆人民。尤其是共匪对佛教的破坏，堪称史无前例，例如没收寺产、驱逐僧尼、焚毁经典、破坏佛像等，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佛教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劫。且与去年，共匪推行一种“人民公社”的制度，剥削人民仅有的民力民财，破坏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宗教被破坏了，家庭被破坏，大陆上的人民所过的生活，没有家庭可栖止，又没有精神安慰，简直是恐怖的压迫，到了极点，所以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怒。我们应当以大无畏的精神，来支持西藏教胞，消灭摧残人在铁幕内受尽痛苦的同胞，使他们从黑暗痛苦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我们庆祝佛诞才有意义！³⁶

可见，时论通过“自由中国”的塑造，可以引入“共匪暴行”、“反攻复国”等一系列足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要素。

而即使在时论文章中没有写明，其也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输出功能。所以在职能上，“自由中国”与“大陆沦陷”在时论中出现的作用是相似的，都作为反共程序中编程的先决条件“if”。这标志着提及自由中国的时论一定带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输出，而非空洞的宣扬。因此，“自由中国”不具备受到政

³⁶ 净心，〈庆祝佛诞的意义〉，《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第8期，页24。

治口号化的影响。

“自由中国”的称呼因高度绑定政治意识形态，使得该主题也消失在冷战末期台湾民族化的进程中。随着台湾政治体制逐渐民主化和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自由中国这一表述逐渐被“台湾”或“中国”这一类名词替代³⁷。此时，有关自由中国的时论已经不再能精准突显台湾佛教的政治身份与立场，故在70年代中后期，过去在《中佛刊》中高频出现的有关“自由中国”时论消失殆尽了。

第四节 声援西藏藏传佛教

1951年，中共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西藏过去的行政体制是政教合一，宗教领袖也是政府的最高政治领导者，因此佛教在地区拥有绝对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在西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遭到来自西藏传统社会结构和藏传佛教产生强烈的反映和抵抗。其在冷战背景的全球秩序下经过意识形态地渲染，成为《中佛刊》时论中热门的主题。

声援西藏佛教同样是台湾佛教与台当局之间加深纽带的绝妙契机。因为这一主题不仅符合佛教徒发动主观性，维护佛教教胞，抒发对信仰自由的需求；还能契合政府反共的政治需求，因此“声援西藏佛教”的时论文章与其他带有宣传佛理的文章不同，大多全篇都在履行意识形态宣传的职能，且十分契合彼

³⁷ 引用若林正文对台湾上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登场的阐述，其中包括“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对冲。详见若林正文，《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国台湾化的历程》，页176。

时台湾的政教关系。如《为西藏反共抗暴吁请支援》中白圣就西藏佛教对中共的反抗进行了描述：

随四帮阴谋出声我国西部大佛教区，强行破壞西藏地方原有的自治而籌大的武装起义，均已与匪军数度恶战，予匪重创；由于各地或大或小的馨应和支持，抗暴起义的力量已渗入拉藤，分布全藏。虽然匪帮已使用强大暴力从事轰炸屠杀，但吾人深信具有天时、地利尤其人和的反共革命一定可以此仆彼起再接再厉的进行。³⁸

描述完西藏教胞的现状后，便结合“反共抗俄”的政策进行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宣传：

看啊！听啊！中国大陆反共抗俄大革命的号角，已由佛教徒的起义，在“世界屋脊”上响了！凭着佛教大雄、大无畏的精神，世界舆论的同情，海内外全体同胞作后盾，再加上政府贤明而有力的支持和领导，此种护国护教的义举，定能达到必胜必成的目标。³⁹

而后的文章往往都会结合西藏佛教的反抗事件，衍生出佛教对于反共的十足意义与潜力。在《中佛刊》创刊前十年里就出现许多以此为主题的时论文章，如名为戴角虎的作者在《从共匪撤退西藏证明佛教精神的胜利》中结合西藏佛教

³⁸ 白圣，〈为西藏反共抗暴吁请支援〉，《中国佛教》，1956年6月15日，复刊第1卷第1期，页2。

³⁹ 白圣，〈为西藏反共抗暴吁请支援〉，页2。

对中共和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抗争，一方面夸赞佛教作为信仰具有反抗的任性；一方面将台湾佛教与政府绑定在一起。以下为节选：

……只有佛教才是反共抗俄最坚强、最有力量的精神武器，只有佛教精神才能使一切邪恶势力无法立足。为什么朱毛匪帮能够窃占整个中国大陆，却对小小的西藏束手无策呢？因为西藏民众个个都有极坚强的佛教信仰，所以共匪永远无法征服他们。

……东南亚的泰国、缅甸、锡兰等国，虽然被称为佛教发达，但基督教仍然有传播的空间，这些国家也有少数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只有西藏这个地方，在大陆沦陷前的几十年中，尽管基督教国家曾多次派遣传教士前往西藏，结果都遭遇失败，最终不得不放弃……基督教凭借雄厚的财力，毛贼东凭借凶猛的武力，都无法征服西藏。啊！伟大的西藏！伟大的佛教！

自由中国几年来，佛教一天天蓬勃发展，因此社会安定，反共意志坚强，使共匪侵台的梦想无法得逞。由于共匪在西藏被迫撤退，我们更深信一切邪恶势力必将消灭，佛教精神最终获得胜利。⁴⁰

这篇关于声援西藏的时论文章是具有代表性的。不仅是代表声援西藏藏传佛教一类的文章宣传意识形态的方式；还是《中佛刊》中向政府表示佛教在政治上立场和作用的文章代表。因为戒严体制下政府“重耶轻佛”的宗教歧视，使得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受到抑制⁴¹；所以佛教徒通过论述佛教的反共潜质，对反共抗

⁴⁰ 戴角虎，〈从共匪撤退西藏证明佛教精神的胜利〉，《中国佛教》，1957年6月30日，第2卷复刊第1期，页18。

⁴¹ 侯坤宏提到戒严体制下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因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信仰基督教，使得社会有以信仰基督为荣的倾向，连带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均收到压抑。且政府也发布不平等条约般

俄、反攻大陆等政策的巨大作用，以求得到政府的重视或一定的地位，获取更加宽松和优待的信仰政策。

阐述佛教对政府反共有利的时论在《中佛刊》中占据着一定比例，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讨论到。而对于声援西藏的时论文章，在1961年有中佛会发表的《血雨腥风话西藏——一位西藏难民普布的叙述》一文发展到顶峰，可以说是《中佛刊》内所有西藏时论的文章中对声援性质发挥最有功效力的。这篇社论来自难民寄给中国佛教杂志社叙述西藏现状的信件，文中就来源和真实性有在开篇特别说明：

这是藏印边境某地一位汉族难民某君的来信，叙述共匪在西藏奴役藏胞的情状甚详。他在信中说，一位叫普布的藏胞（日喀则人）于本年一月二十六日自西藏亚东匪区逃到藏边，对某君痛述匪区情状，某君当时即将普布的藏语叙述全部用汉文记录下来。某君并将共匪发给普布的配给证（汉藏文并用）摄影寄给本社。某君该篇记录文字虽不甚通顺，且有别字，但为存真起见，本报特一字不改地原文刊载如下……⁴²

编辑社把信件中记录的文字以“昔日乐土今成地狱”作为标题，再分为“配给不敷饿殍载道”、“男女尽被迫充奴工”、“寺院古物破坏无遗”、“吁请世界拯救西藏”四个小题归类，将信件刊登出来以示声援。以下节选末尾段：

的政策针对佛教等不得势宗教，诸如《台湾省修建寺庙庵观应行注意事项》的颁布。详见侯坤宏，〈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页67。

⁴² 中国佛教杂志社，〈血雨腥风话西藏——一位西藏难民普布的叙述〉，《中国佛教》，1961年2月15日，第5卷第6期，页5。

西藏人民在共匪惨暴之下，自杀及饿死者不可计其数，男女老幼祈祷着早日死亡……尚有无数的西藏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过着极悲惨的生活，我愿望我乞求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甚于人道主义，赐以同情的援手。⁴³

而该社论特殊的另一原因，是文章仅对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公开声援，并没有按惯例对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原因可能是编辑社为力求真实而原文刊登，但在冷战背景下，得如此契机却没有借机发挥，在同类型文章里是并不常见的。

涉及西藏的时论仅在50年代至60年代高频出现。随着1961年西藏叛乱平息后，便在《中佛刊》中鲜有提及了。但因西藏佛教徒对抗中共这一历史，台湾佛教“反共”的功能逐渐被放大，并形成一种新的趋势。

第五节 反共的意识自觉

上一节简单提到佛教界通过高度配合政府“反共”政策，以争取政府的青睐，从而在台顺利发展佛教。这类提及或是主张“发展佛教有助于政治正确”的时论在冷战时期的《中佛刊》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可见其与“反共抗俄”的主题一样符合主观需求，构成该刊物时论长期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在大框架“佛教依附政治”不变的情况下，台湾佛教界的反共意识出现了自觉性，使得时论中对政教关系表达的意识也出现了流动。

《中佛刊》初期体现的政教关系，是佛教积极响应、配合政府的反共政策。

⁴³ 中国佛教杂志社，〈血雨腥风话西藏——一位西藏难民普布的叙述〉，页5。

因为戒严时期的佛教在台湾发展，需要改变政府对佛教的不重视甚至是歧视；所以台湾佛教界常为配合“反共”国策，参加相关活动以示对政府的支持。因此该时期时论中对政教关系的根本意识，是佛教需要配合政府反共以获得方便。《中佛刊》中就有很多教闻记录当时佛教通过各种活动或法会响应政府的号召。

拿佛教界在朝韩战争时期对政府政策的响应为例。在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背景下，美国将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遣送至台湾。这些战俘在台被国民党政府塑造成“反共义士”进行宣传。中佛会作为反共义士援助会的主席团之一积极参与响应，例如中佛会组织佛教慰问团前往义士村慰问反共义士⁴⁴等。当时佛教会和战俘之间用书信交流互动，中佛会鼓励并激励他们加入反共抗俄的阵营，为反攻大陆做贡献⁴⁵。在《舍己救同胞·乃佛者正途！》提到一位佛教徒战俘决定加入国民党军队，以发挥佛家精神：

刘仁斌义士是一个“在家出家”的修行者，根据他对佛学的研究，他认为唯有做一个反共抗俄的军人，从事杀朱拔毛的工作，拯救大陆同胞才是学佛者的正途，才真正地做到了佛家“大慈、大悲、大无畏”的精神。⁴⁶

时论除了鼓励“反共归国义士”中的佛教徒参军反攻大陆，还有的文章希望“反共义士”中的佛教徒能够在军中弘扬佛法的观点：

⁴⁴ 中国佛教杂志社，〈各地教讯·本会常会通过 组团慰问义士述〉，《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8。

⁴⁵ 成一，〈读“陈文光义士与中国佛教会书”后〉，《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5。

⁴⁶ 中国佛教杂志社，〈舍己救同胞·乃佛者正途！〉，《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6。

本年春初，你们回到宝岛，举国欢腾，中外钦仰！时光易逝倏迩半载。现在你们又已重着戎装，参加反共复国的劲旅了……你们今天有已参加六十万国军的阵营，我希望你们把在韩期间，弘法护法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三军去……国际风云日紧，反攻大陆，说不定就在明天，在未来反反攻的战场上，正是我们佛徒先入地狱和即身是佛弘法度生的道场……反共的佛徒义士们！半年前看见你们回归祖国不久，我们更将看见你们返回大陆去，收复故国锦绣的河山了。⁴⁷

文中建议佛教徒把佛教精神扩展到三军去的观点是新颖的。说明佛教在支持政府反攻大陆的政策时不仅仅可以出人力充当士兵，还可以把佛法作为军中的思想武器去抗衡的大陆的共产主义思想。《由金门的佛教谈到当前军中得的佛教》一文中就有相似想法的陈述：

反攻的时候快到了，物质的积极准备，是极需要的；但是，请不要忽略精神上的动员，我们目前急需要在军中建立了精神堡垒，使每个战士心头，燃起“般若”之火，把马、恩、列、史的唯物邪说，共产主义一向自诩为宝典的精神窠臼，一概焚光。⁴⁸

自此，台湾佛教从通过实体活动支持政府的反共政策进一步延伸至对教义、教理层面的诠释与实践中，以求在思想上树立“反共”旗帜。这种转变表明，此时台湾佛教的反共意识已开始具备一定的独立性，逐步脱离单纯依附于官方政

⁴⁷ 同道，〈一份公开的信〉，页6、7。

⁴⁸ 妙风，〈由金门的佛教谈到当前军中得的佛教〉，《中国佛教》，1958年10月15日，第3卷第2期，页28。

策的局限，形成其自发的思想体系与宗教实践逻辑。

而此时的台湾佛教毕竟是“配合”政府，那么自然是没有主动性的。“佛教反共”的时论在实践中是离不开像“反攻大陆”等政府决策的。第4卷第10期的社论《中国佛教研究院未来的展望》就很清晰地交代了此时台湾的政教关系：

现在的自由中国，急需要佛教的发扬光大，来辅助政府的推行。改善社会风气，加速完成反共复国解救同胞的大计……一旦反攻开始，随军布教，安慰劫后遗黎，重建大陆佛教……皆知反攻行动必以军事作前驱，佛教要配合反攻军事行动，自必先准备能与军民协力活动于前线之青年僧伽，以担任此冒险犯难之重任。吾人亦知大陆上佛教经千余年俄帝与奸匪之摧残迫害，已濒存亡绝续之交，将来反攻军事进展，尤赖有人地咸宜之僧伽负起存亡继绝重建复兴之大任。⁴⁹

当反共意识在台湾佛教界产生了独立性的自觉，那么其自身也拥有了主动性。在《欣闻缅甸以佛教为国教》中提及：“佛教是永远不能与共产主义、唯物邪说并存的；且如发扬佛教的功用，必能增强反共势力至于无限大，而使恶魔乃为举世所共弃。”⁵⁰这使得台湾佛教在政治上虽依然附着政府，但反共的意识被剥离、独立了出来。时论中对政教关系表达的意识，从“佛教因为配合政府所以反共”发展成“佛教因为反共所以帮助政府”。虽然身份在政治上仍为附庸，但在反共的立场上已成一种类似“战友”的关系。而随着“反共阵营”

⁴⁹ 中国佛教杂志社，〈中国佛教研究院未来的展望〉，《中国佛教》，1960年6月15日，第4卷第10期，页4。

⁵⁰ 中国佛教杂志社，〈欣闻缅甸以佛教为国教〉，《中国佛教》，1961年1月15日，第6卷第2期，页2。

里身份的提高，佛教在时论中一时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里的“大敌”，有如《追思虚云大师》一文：

共匪为什么千谋百计要来毁灭佛教呢？我们知道：共匪的一举一动，是受到苏俄在幕后的操纵，共匪本身毫无自由可言。中国佛教，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魂，只要中国佛教存在的一天，苏俄帝国主义要想以马列主义新宗教，来统治中国的狂想，就始终无法实现，而匪伪的政权，总崩溃的威胁，就永远存在。⁵¹

这种趋势使得自60年代起，时论开始强调佛教自身对反共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文章中的，是一种“宗教和唯物主义的冲突”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峙”并论的状态。

⁵¹ 中国佛教杂志社，《追思虚云大师》，页3。

第三章 代表高僧的时论文章

侯坤宏教授在研究中提到，佛教的领导阶层大都具有良好的党政背景。如白圣、乐观、章嘉、南亭、律航、净心等法师，为了使弘法活动能顺利进行，必须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反共活动⁵²。《中国佛教月刊》作为中佛会的宣传媒介，上述的高僧们自然有留下笔墨。本章就以在《中佛刊》拥政时论中露面较多的章嘉、白圣两位法师为代表，暂忽略其是否有笔名的可能性，仅结合他们的或提及他们的反共言论（或新闻）补充前人的研究。

第一节 章嘉

章嘉实为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本名罗桑班丹毕蓉梅⁵³。民国时期，章嘉自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行宪后又任总统府资政、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同年被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的尊号，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⁵⁴。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政权的终结，当时位于南京的中国佛教会也停止办公，结束了在大陆时期的会务工作。撤台后，政府命令群龙无首

⁵²详见侯坤宏，〈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页73。

⁵³ 中国佛教杂志社，〈章嘉呼图克图应化事略〉，《中国佛教》，1957年5月27日，第1卷第11、12期，页18。

⁵⁴侯坤宏，〈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页76。

的中佛会改组。1952年，章嘉再度连任理事直至1957年3月4日圆寂⁵⁵。章嘉佛教组织撤台前就是理事长，因此中佛会在台复会后自然拥有话事人的资格；这使得《中佛刊》在创刊初期受到过章嘉巨大的影响，包括对“反共”主题地呈现。

章嘉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的反共属性。在1954年3月至1957年5月这一时期，共统计《中佛刊》13期，章嘉因个人名义发表或被提及的反共时论文章共有14篇。除去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篇章，本节将再补充一二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1954年7月10日第1卷第5期，在代表中佛会接待日本来台佛教访团时的致词，以《欢迎日本佛教访问团来华致词》一文的形式刊登在《中佛刊》中，他说：

共产党一贯的认为佛教为其最后而最强的敌人，必欲尽其百般手段澈底消灭佛教而后快，我国受共党之祸最早最烈，而对共党的了解亦最深刻，所以我国在我总统蒋公领导下，已建成了反共抗俄，同时也就是护持佛教的坚强堡垒。我们诚恳的希望贵团呼吁贵国佛教徒，一切人民和政府赶快与我们协力合作，共同担负起反共抗俄救教的历史使命。⁵⁶

对世界佛教徒的联合抗共，在第六期（1954年8月10日）中代表中佛会发表的《重要公文·覆古巴久斯马谛纪念会主席函》和《重要公文·覆贺日本佛教联合会成立函》两篇对外公文中，提到：

人类最大的悲哀！在我们这个世界竟然出现了共产恶魔。他们已经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土地建立起牢狱式的铁幕，在那里受禁锢、受奴役的无辜人

⁵⁵ 杨书濠，〈潮起与潮落（1945–2010）以战后“中国教会”的在台沿革及其转型为中心〉，页98。

⁵⁶ 章嘉，〈欢迎日本佛教访问团来华致词〉，《中国佛教》，1954年7月10日，第1卷第5期，页1–2。

民竟然达到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以上。我们中国佛教徒奉行佛陀的慈悲救世教义，已经对共产恶魔艰苦抗争了二十七年之久。我认为今日世人纪念久斯马谛，应该尊崇他的理想，效法他的行事，大家联合起来消灭共产恶魔，解救受奴役的人民。⁵⁷

共产党的无止境摧残佛教，使得我们中国佛教徒受害最深，理解也最深。因此，本会在七月间也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参加了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总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⁵⁸

章嘉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共，以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对台湾当局反共的支持。同时，章嘉也致力于在国际场域中与中共主导的佛教组织竞争，以争夺“中国佛教”正统性的地位。向国际社会展现其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分野，并确立自身作为“中国佛教”合法代表的身份。1954年10月5日，章嘉在《中佛刊》中发表《本会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郑重其辞的促请提案谴责共产集团，防止匪帮混入代表大会：

匪帮捕尼、杀尼、毁寺塔、焚经、侮辱佛像，强令老年僧尼服苦役，将青年壮年送去参军上战场充当炮灰，青年壮年尼姑被迫还俗嫁人，或被驱赶到战地充当营妓。种种残害、毁灭佛教的罪行，早已为全世界周知的事实。凡是发心实践佛陀教法的人，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理应共同努力降伏赤色恶魔，拯救被压迫的佛教徒，解救占世界佛教徒多数的苦难同胞。绝不

⁵⁷ 章嘉，〈重要公文·覆古巴久斯马谛纪念会主席函〉，《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5。

⁵⁸ 章嘉，〈重要公文·覆贺日本佛教联合会成立函〉，《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5。

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坐视不理；更不能违背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主要宗旨与基本理想，与恶魔谈友谊。那实际上便等于成为恶魔扩张侵略的得力帮凶。其结果必将使恶魔更加肆无忌惮地摧残佛教，破坏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那样一来，就是佛教徒因疏忽大意而导致佛教的自毁，其必然的影响将使这唯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最终丧失灵魂，直至毁灭！⁵⁹

章嘉在《中佛刊》的前三年中，可以称得上杂志里反共时论的领袖者。1957年3月4日章嘉法师因胃疾于台北圆寂，当局特别成立由多部门联合组成的“章嘉大师圆寂典礼委员会”负责身后事宜，包括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等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如蒋介石、陈诚及多名政府要员纷纷前往上香致敬，这体现了章嘉在当时在政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佛刊》杂志社在第十一、十二期发布社论悼念章嘉的逝世：

大师当选连任第二届理事长，领导全国佛教徒，以及信仰佛教之人民，致力于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之大业。大师认为共产主义与佛教绝对不能相容；共产匪帮，残民以逞，实为人类之公敌，其暴戾政策，血腥统治，当为天人所共恶，无论目前若何猖獗，终必在正义人道之前，迅就覆灭。四十一年九月，大师率领佛教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于东京，曾提谴责共产匪党迫害佛教案；其后对国内外发表揭发共匪阴谋与罪行之文告甚多，深为世界佛教徒所敬信。⁶⁰

⁵⁹ 章嘉，〈本会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中国佛教》，1954年10月5日，第1卷第7、8期，页1。

⁶⁰ 中国佛教杂志社，〈章嘉呼图克图应化事略〉，页18。

第二节 白圣

白圣是《中国佛教月刊》的发行人，早期为刊物的出版煞费苦心。自章嘉圆寂后，白圣法师便从章嘉手中接棒成为《中佛刊》中输出政治立场的主力军。1960年中国佛教会第三届理监事改选，白圣被推举为理事长⁶¹；白圣的政治身份，带领台湾佛教界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反共政策，在台湾佛教于60年代出现反共自觉性后迹象更是明显。乐观称：“白圣担任中佛会理事长之后，居然把中佛会做成强有力的中心，成为自由中国佛教反共的堡垒，这全是他精神与才能的体现。”⁶²而后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国际外交势衰之时，白圣组建“中国佛教访问团”，出国宣扬“反共”政策的同时，拉取国际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支持。

白圣法师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反共的主动性是十分明确的。在台湾举办的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白圣作为主席发言：

全世界差不多都知道，有我这么个反对共产党的和尚……因为我是佛教徒，共匪是毁灭佛教，以及各种宗教的；我是自由思想主义者，共匪是不使人得到自由的。我们佛教是以慈悲为宗旨，使众生离苦得乐，共产党恰恰与慈悲相反，他们是增加众生的痛苦，剥夺众生的快乐（使众生有苦无乐），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⁶³

⁶¹ 杨书濠，〈潮起与潮落（1945–2010）以战后“中国佛教会”的在台沿革及其转型为中心〉，页106。

⁶² 摸象人，〈白圣老法师来台后行履纪要〉，《中国佛教》，1975年2月15日，第19卷第5期，页3。

⁶³ 白圣，〈向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中国佛教》，1974年11月15日，第19卷第1、2期，页3。

白圣在《中佛刊》的反共时论文章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广。本节主要举例最有代表性的两类主题：一、佛诞节向大陆广播；二、参加国际反共联盟活动。

60年代，为配合政府的“反共”政策并宣传反共意识形态，白圣法师每逢中佛诞节都会亲自撰写广播稿。在广播里会对比台湾和大陆的佛教处境，通过批判中共在大陆对佛教的打压和破坏，进一步突显台湾佛教在“自由世界”中的优越性与正统性。这种通过佛诞节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既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也体现了佛教界在政治动员中的特殊作用。

1957年5月27日，《中佛刊》第一章第十一、十二期合刊首次刊载了白圣法师撰写的《佛诞节向大陆佛教同胞广播》。内容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皆是先描绘了台湾“自由中国”佛教活动的盛况，突出台湾在佛教复兴和文化传承方面的成果；再通过“反观大陆”的叙述方式，批判中共政权对佛教的迫害及其在大陆推行的“伪佛教”现象；最后，文章以号召的语气向大陆佛教徒宣传意识形态，称贤明的国民党政府很快将“反攻大陆”⁶⁴。这类的广播在《中佛刊》中多次出现，白圣将台湾佛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需求紧密结合，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提供了舆论支持。

这些由白圣法师撰写的广播稿，其功能非常符合政府的需求，因此在早期每年都会刊登，甚至还有国外扩张的广播。例如：1959年4月15日，《佛诞节向日本佛教同仁广播》一文向日本强调“自由中国”的佛教盛况，同时提及人民公社、西藏事件及中共迫害佛教的现状。呼吁日本佛教界不要与中共政权合作⁶⁵。姊妹篇《佛诞节向大陆同胞广播》通过“自由中国”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佛教

⁶⁴ 白圣，〈佛诞节向大陆佛教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57年5月27日，第1卷第11、12期，页8。

⁶⁵ 白圣，〈佛诞节向日本佛教同仁广播〉，《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第8期，页23。

境遇对比，着重描述中共的反宗教政策，从而强调反共抗俄及西藏问题，同时鼓励大陆民众对“反攻复国”抱有希望⁶⁶。

而广播的基调因为始终如一而变得口号化，1964年之后《中佛刊》中类似的广播稿逐渐减少，空洞的政治化宣传逐渐让位于更务实的宗教发展事务。1964年5月15日最后一次刊登的《向大陆同胞广播》中，文章基调较为缓和，以介绍台湾佛教的发展现状为主，仅在最后一部分提及对中共的批判，其余皆在回溯佛教在台复兴的历史⁶⁷。

到了70年代，国际关系的剧变对台湾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冷战格局的改变，“七二年体制”使得台湾失去冷战前哨基地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进入国际社会。⁶⁸在此背景下，台湾的“反共”政策在国际上失势；因此作为回应，台湾通过参与世界反共联盟等国际组织，试图维持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感。为配合政府，白圣带领“中国佛教访问团”频繁出席国际反共联盟会议，以宗教为媒介进行政治宣传。

如1975年，白圣法师代表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参加世界反共联盟第八届大会，在致辞中重申“宗教本质上都是反共的”立场，并强调反共力量分为政治和宗教，而“宗教是没有地域性的”。即使政治会受到国际形势影响，也要联合世界宗教徒反共⁶⁹。

然而从宗教的角度呼吁已经不满足政治反共的急迫需求了。在多个反共联盟会议中，白圣法师以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身份，发表关于“反集权、反

⁶⁶ 白圣，〈佛诞节向大陆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第8期，页23。

⁶⁷ 白圣，〈向大陆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64年5月15日，第7卷第7、8期，页10。

⁶⁸ 若林正文，《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国台湾化的历程》，页6。

⁶⁹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代表白圣老法师 向世界反共联盟第八届大会致词原文〉，《中国佛教》，1975年4月15日，第19卷第7期，页6。

侵略、反迫害”的严正声明，呼吁展开与极权和侵略势力的斗争⁷⁰。1976年白圣在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第二十三届大会和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第十届大会上发表纯政治性质的演讲，强调中共对亚洲及全球局势的威胁。他指出：“我认为今日世界祸乱的根源在亚洲，而亚洲祸乱的根源是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大陆而起。”⁷¹白圣认为只有摧毁“中国大陆匪伪政权”重建“自由中国”，才能带来亚洲与全世界的光明。在文中甚至舍弃了一如既往对中共迫害佛教的论述，而是坚持自由民主和共产集权的意识形态斗争⁷²。

白圣将宗教团体高度政治化的策略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随着冷战的尾声，台湾国民党政府开启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同时两岸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反共”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要政策，但政府逐渐将关注点转移至台湾本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与发展上。佛教组织的反共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政策需求相适应的，然而，当政府政策重心由外部对抗转向内部建设后，佛教团体所承担的反共功能逐步被边缘化。

⁷⁰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 第七届世界青年反共联盟大会 第二十二届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会议 第九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 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佛教》，1976年5月15日，第20卷第8期，页2。

⁷¹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出席 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第二十三届大会 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第十届大会 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佛教》，1977年5月15日，第21卷第8期，页3。

⁷²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出席 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第二十三届大会 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第十届大会 代表团报告书〉，页3。

第四章 结语

本篇论文以冷战时期《中国佛教月刊》的时论文章为切入点，分析其反映的佛教立场，以佐证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国佛教月刊》作为冷战时期台湾中国教会的主要宣传媒介，其时论文章不仅体现了在台佛教界的政治态度，也反映了佛教与政府间的深度绑定关系。因台湾佛教的发展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管控，佛教团体通过展现政治忠诚，尤其是紧随“反共”政策，来争取政府的支持。这种附属关系促使台湾佛教界从组织到个体逐步形成反共的政治意识自觉，《中佛刊》的时论文章则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载体。

本文从文本角度补充和再诠释了冷战时期台湾的政教关系，系统分析了时论文章中意识形态宣传的发展历程——由早期的积极、中期的自觉到后期的衰退。研究以统计和分类为基础，通过对文章内容的引用分析，展现了戒严时期台湾政教关系的高度依附性及其逐渐转型的过程。

然而，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且篇幅有限，本文仅对冷战前期时论热点较密集的文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而对佛刊中70年代外交变化以及冷战后期解禁前的政治言论涉及较少。此外，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佛教月刊》，未能结合同时期其他佛教期刊与政论文章；对法师言论的整理亦限于最具代表性的两位法师。这些局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政教关系这一类从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无论是从佛教视角还是从政治视角都已有成熟的研究，而从文本视角补充塑造这段历史仍有很大的空间。未来研究结合更多文本资料，拓展对冷战时期台湾佛教政教关系的全景式探讨，提供更全面的视角与支撑。

参考文献

译著

1.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译，《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

期刊论文

1. 何卓恩，〈党化教育vs公共教育：《自由中国》的教育论述〉，《思与言》2011年49卷第1期，页45–80。
2. 侯坤宏，〈互动与互惠（1945–2011）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历史的新局开展及其在地转型问题〉，《北台湾通识学报》2011年4月第7期，页31–87。
3. 江灿腾，〈二战后台湾汉传佛教的转型与创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0年10月第2期，页167–177。
4. 杨书濠，〈潮起与潮落（1945–2010）以战后“中国教会”在台沿革及其转型为中心〉，《北台湾通识学报》2011年4月第7期，页87–139。

杂志文章

1. 白圣，〈编后琐话〉，《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8。
2. 白圣，〈佛诞节向大陆佛教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57年5月27日，第1卷第11、12期，页8。
3. 白圣，〈佛诞节向大陆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第8期，页23。
4. 白圣，〈佛诞节向日本佛教同仁广播〉，《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

第8期，页23。

5.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出席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第二十三届大会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第十届大会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佛教》，1977年5月15日，第21卷第8期，页3。
6.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代表白圣老法师向世界反共联盟第八届大会致词原文〉，《中国佛教》，1975年4月15日，第19卷第7期，页6。
7. 白圣，〈世界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第七届世界青年反共联盟大会第二十二届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会议第九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代表团报告书〉，《中国佛教》，1976年5月15日，第20卷第8期，页2。
8. 白圣，〈为西藏反共抗暴吁请支援〉，《中国佛教》，1956年6月15日，复刊第1卷第1期，页2。
9. 白圣，〈为中佛刊发行说几句话〉，《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3。
10. 白圣，〈向大陆同胞广播〉，《中国佛教》，1964年5月15日，第7卷第7、8期，页10。
11. 白圣，〈向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中国佛教》，1974年11月15日，第19卷第1、2期，页3。
12. 成一，〈读“陈文光义士与中国佛教会书”后〉，《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5。
13. 慈氏，〈对于中佛刊的献议〉，《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2。
14. 戴角虎，〈从共匪撤退西藏证明佛教精神的胜利〉，《中国佛教》，1957年6月30日，第2卷复刊第1期，页18。
15. 梵影，〈西游散记〉，《中国佛教》，1957年3月8日，第1卷第9、10期合刊，页

22。

16. 胡国伟，〈开释迦老子的玩笑〉，《中国佛教》，1956年6月15日，复刊第1卷第1期，页7。
17. 净心，〈庆祝佛诞的意义〉，《中国佛教》，1959年4月15日，第3卷第8期，页24。
18. 净心，〈总统蒋公与佛教〉，《中国佛教》，1975年4月15日，第19卷第7期，页5。
19. 妙风，〈由金门的佛教谈到当前军中得的佛教〉，《中国佛教》，1958年10月15日，第3卷第2期，页28。
20. 摸象人，〈白圣老法师来台后行履纪要〉，《中国佛教》，1975年2月15日，第19卷第5期，页3。
21. 南亭，〈地藏菩萨事迹——中国佛教会佛学讲座第四次座谈会议〉，《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0、11。
22. 释律航，〈台湾弘法回忆录〉，《中国佛教》，1956年11月30日，第1卷第4期，页22。
23. 同道，〈一份公开的信〉，《中国佛教》，1954年7月10日，第1卷第5期，页6、7。
24. 吴仲行，〈佛教徒应有的责任〉，《中国佛教》，1954年3月15日，第1卷第1期，页3。
25. 张清杨，〈漫谈生死与因果关系〉，《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4。
26. 张廷荣，〈佛家基本精神〉，《中国佛教》，1959年3月15日，第3卷第7期，页18、19。
27. 张廷荣，〈敬德对学人用功的效益〉，《中国佛教》，1959年1月15日，第3卷第5期，页6。
28. 章嘉，〈本会致使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中国佛教》，1954年10月30日，

第1卷第7、8期，页1。

29. 章嘉，〈本会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公函〉，《中国佛教》，1954年10月5日，第1卷第7、8期，页1。
30. 章嘉，〈边人微言〉，《中国佛教》，1954年6月10日，第1卷第4期，页2。
31. 章嘉，〈发刊辞〉，《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1。
32. 章嘉，〈欢迎日本佛教访问团来华致词〉，《中国佛教》，1954年7月10日，第1卷第5期，页1-2。
33. 章嘉，〈重要公文·覆古巴久斯马谛纪念会主席函〉，《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5。
34. 章嘉，〈重要公文·覆贺日本佛教联合会成立函〉，《中国佛教》，1954年8月10日，第1卷第6期，页15。
35. 证空，〈简介木里王国〉，《中国佛教》，1957年6月30日，第2卷复刊第1期，页19。
36. 中国佛教杂志社，〈八百万佛教徒敦请蒋公候选连任总统〉，《中国佛教》，1971年12月15日，第16卷第4期，页25。
37. 中国佛教杂志社，〈对政府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之省思〉，《中国佛教》，1987年10月31日，第31卷第10期，页1。
38. 中国佛教杂志社，〈各地教讯·本会常会通过组团慰问义士述〉，《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8。
39. 中国佛教杂志社，〈国大第二次会议有关佛教的提议〉，《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7。
40. 中国佛教杂志社，〈舍己救同胞·乃佛者正途！〉，《中国佛教》，1954年3月1日，第1卷第1期，页6。

41. 中国佛教杂志社，〈推举蒋院长出任总统全国佛教徒欢欣拥戴〉，《中国佛教》，1978年2月15日，第22卷第5期，页18。
42. 中国佛教杂志社，〈欣闻缅甸以佛教为国教〉，《中国佛教》，1961年1月15日，第6卷第2期，页2。
43. 中国佛教杂志社，〈血雨腥风话西藏——一位西藏难民普布的叙述〉，《中国佛教》，1961年2月15日，第5卷第6期，页5。
44. 中国佛教杂志社，〈章嘉呼图克图应化事略〉，《中国佛教》，1957年5月27日，第1卷第11、12期，页18。
45. 中国佛教杂志社，〈中国佛教会代表全国佛教徒上电总统敬贺连任〉，《中国佛教》，1972年4月15日，第16卷第8期，页25。
46. 中国佛教杂志社，〈中国佛教研究院未来的展望〉，《中国佛教》，1960年6月15日，第4卷第10期，页4。
47. 中国佛教杂志社，〈追思虚云大师〉，《中国佛教》，1959年11月15日，第4卷第3期，页3。